

# 在异国重启现代性——中欧哲学化外交的一次实践

作者：布鲁诺·拉图

巴黎政治大学教授，以及 AIME 小组成员

翻译：栾诗璇

很显然，与现代化相关的普世的发展目标和今天地球的现状之间是矛盾的。地球科学家们在近年来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新阶段：在此期间人类作为一种地质范畴中的力量，能够持久地影响地球生态；尽管这个概念仍然具有争议性，但它为定义人类发展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争议是对另一个矛盾的补充，这个矛盾就是在财富分配上明显的社会分层，自社会主义诞生之初它便塑造着政治思想。这两个矛盾共同定义了一系列的政治现状，而它们正是今天每个国家的公民所勉力应对的。

尽管第二个矛盾一直被忽视、淡化、排斥和否认，它在 2015 年 12 月巴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sup>1</sup>上变得明确起来。在这次会议上，所有国家都同意限制自身对化石燃料的使用，但是同时也意识到，他们各自的发展项目不能在地球和气候科学家界定的狭窄范围内顺利推进。除了明确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及其对气候的影响外，最后签署的条约还明确了这一所有与会国家都不能继续忽视的紧急的态势。但这次声明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做好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的准备——事实上，差得很远。但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是“房间里的大象”，它在任何一场政治集会中都存在。人们可以拒绝承认它，但决不能忽略它。

现代化带来一种普遍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催生出社会问题，这是社会主义所触及的第一个矛盾；同时，关于社会问题的意识与生态悖论相互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更难达成一种一致的政治立场。现代化并没有一个可以使之在其中持续发展的物质世界。因此，我们所说的对现代性的目标和方向的“重置”（reset）是必

---

<sup>1</sup> 201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简称 COP 21 或 CMP 11 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2 日在法国巴黎举行。

要的。

什么是重置？实际上，重置是使我们的仪器（电话、天平、照相机等）对输入的数据更敏感的一组程序。它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中常等同于“重新开始”（Starting again）或甚至“重启”（rebooting）。重置不是一场革命或一块白板（译注：原文为 *tabula rasa*，哲学术语，指人类个体没有与生俱来的心智）；这是一组特定的程序，以此去重新校准仪器；比如，当指南针失去了为我们的位置提供准确指示的能力的时候。做一个比喻的话，重置可以使我们的观念与情绪的部件对新环境敏感起来。

显然，由于每个民族都面临着现代化与地球现状之间的矛盾，它们也因此都在试图重新校准他们的现代化进程；那么不同的民族应对相似情境的方式就具有对比的可能性。这个比较非常有趣，因为从历史上看，每个国家对现代化发展的反应不一。尽管它看上去具有普遍性，但是就那个被称为“全球化”的复杂系统以及多样的文化勾连而言，没有什么比它更具历史偶然性的了。换句话说，没什么比全球化更不“全球”的。

我们如何比对这些多种多样的复杂的历史？一种方式是考察自 16 世纪和 17 世纪现代化运动开始以来欧洲是如何来对付这个运动的。AIME 项目就通过发起可被称为“现代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的工作来进行这一尝试。它从 30 年前开始，两本书因此诞生：《我们从未现代过》（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出版于 1991 年）<sup>2</sup>和《存在模式探究》（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出版于 2012 年）<sup>3</sup>。在这个研究框架之下，现代主义（Modernism）不能确凿地被定义为历史的进步，而是一个谜一般的、短暂的运动，必须依靠经验对它的多样性和矛盾进行研究。在这样的研究中所获得的一个主要的不太符合逻辑的结果就是，“我们”，即欧洲人，“从未”现代过。这意味着现代性不应被推崇或者批评，从根本上说它是不可实现的，因为“现代世界”无法找到其在地球上存在的可靠的条件。现代主义——借用宗教化的表达——是完全不属于这个地球的。

AIME 小组决定让这一系列的矛盾看起来更加明确。2016 年在德国卡尔斯鲁厄

---

<sup>2</sup> 拉图尔·布鲁诺，凯瑟琳·波特著。《我们从未现代过》。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sup>3</sup> 拉图尔·布鲁诺。《存在模式探究：一种现代人类学》。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3 年出版。

艺术与媒体中心（Zentrum für Kunst und Medientechnologie Karlsruhe，简称 ZKM）的一个展览中，他们提出了一个相互比照的想法；为此，AIME 提供了一个基于欧洲的重置的样本，并在展览画册（由 MIT 出版社出版）中总结了六个程序。这些程序要求观者重新审视他们对全球化、科学、技术和领土概念的看法，同时讨论了宗教和政治。选择这六个主题的原因是，（至少在欧洲）它们都受到“现代化”概念的限制。每当试图扩大现代化的前沿时，人们对科学、技术、政治和宗教等的理解也会发生改变。然而，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领土的概念上。

我们的展览是一次空前的尝试，去说明欧洲人如何通过重置他们的现代性概念，从而对现代性本身从来没能被明确界定这一矛盾变得更加敏感。在展览结束时，AIME 小组更加确信，这种重置的概念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案，来将其结果与其他国家的类似举措进行对比。

但是，我们应该从哪个国家开始建立这个复杂的对比？中国是一个很直接的选择。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深入地进行了极其迅速的现代化，同时也最深刻地意识到这个进程与其物质和自然基础之间的矛盾。虽然在其他国家这种矛盾可能仍然被忽略或否认，但在中国，官方政策实际上承认了这种不和谐，并正迎头去解决这个问题。中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案例，还因为这种矛盾显然与前文提到的与社会主义相关的悖论有联系。在中国，这两个矛盾之间的联系是明确的，在其他国家却并不总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参与到上海种子中来。它是一个跨学科事件，以一百年的时间来畅想上海的未来。这个项目发生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并聚集了十几个项目。尽管它与我们早先的目标看起来并不相关，但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和这一项目之间的联系并不遥远：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一百年中，上述矛盾将得到解决，要么是借由所有参与者的彻底毁灭，要么当前的状况能发生奇迹般的转变。没有哪个城市比上海更适合去想象这些我们无法预料的景况了。

我们感谢上海种子，我们希望与中国实现这第一次的相遇，去比对不同版本的现代性重置，并测试我们方案的可行性。

这个方案将如何推进？我们将组织一系列的工作坊，它们会围绕专门为讨论而收集起来的文档来展开。为什么我们要强调文档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不想仅仅讨论

想法或世界观。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程度的抽象思考只会得出关于东西方思想差异之类的陈词滥调。此外，这种讨论所立足的关于现代性是什么的问题，常常是完全错误的——这也恰恰是 AIME 项目所要无情批判的。

现代性的对比在现实中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你很难在其他文化中建立起一个和你的文化同等的环境。首先，你必须通过某种重置，将现代性从一种理想转化为一个世俗和复杂的现实。只有当双方平行地按照各自的方式重置现代性时，这种对照才最有意义。

以我们的经验，推行我们方案唯一的有效方式不是从想法开始，而是从文档开始。我们所说的文档是指文本、文章、艺术作品、具有象征意义的工艺品、电影、故事，证词等。围绕文档的讨论会比仅仅介绍想法产出更加生动和不可预测的结果。

我们希望推行的方式与外交会谈相似：在对对方的习俗和行为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双方探讨彼此的利益和意向。我们正在想象一个半虚构的情境，其中欧洲“代表团”开始提供它重置现代化行动的经验，随后是中国“代表团”的回应等等。鉴于在语言、历史和文化等方面众所周知的不可比性，这种半虚构的草案在中欧交往的情境下尤其必要。但是，对我们来说，这种国与国之间的不可比性并非是一种缺陷，正是它们使外交变得如此有趣。有无共同之处并非发起此类交流的先决条件，而只是其可能的结果之一。

然而，达成一致不是唯一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激发这个假想中的中国“代表团”足够的兴趣，让他们利用他们自己的程序和文档，开始推进重置现代性的进程。鉴于欧洲和中国截然不同的现代化历史，期望结果中能有任何相似之处都是荒谬的。重置的确切目的是为了呈现更多的差异，这些差异正是曾经被那种将全球化当作全世界普遍任务的幼稚观念所消除的，或至少削弱的。

为了专注于这样一种外交式的相遇，我们建议我们的工作围绕着现代世界中身份的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的新的转变展开。首先，我们必须准确定义我们所居留的特定的地点；然后明确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也就是说，当代人应该扮演什么类型的历史能动者？这最后的问题有可能是最难回答的。在古典的文论中，关于地点，时间和身份的问题是讨论的起点。

在何处？如果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一定深度和广度，从而为地球带来太直接和剧烈的反应，其后果是令人非常不安的。直到现在，人类或多或少地将自然当作一个稳定的舞台，他们自己则是舞台上的行动者；但今天，这个舞台本身已成为表演的一部分。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土地、领土和边界的新的定义，以及在一片稳定的土地上的，由民族国家所推动的、对于主权概念的彻底的重新定义。虽然历史上围绕着“国家”的概念所存在的主权的定义是在地缘政治的角度上被确立，但一个饱含着冲突的态势正在逐渐消解国家的边界，并强加上其他的地缘政治，这一次是基于更实在的地理和地质学定义。在上海种子项目中去观察参与协商的各方，如何对他们所生活的土地的定义所发生的变化做出反应，这将是很有趣的。

何时？虽然现代化假设了一个持续解放和发展的时代，所有国家将最终融合，但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被要求表现得像是生活在一个新世代（有人称之为人类世），而它有着与过去截然不同的轨迹和视野。很难看清，“进步”这个相对陈旧的观念将通往何处。将自身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文艺复兴或现代性，——并将其他文化与你自己的文化相联系——比如说中世纪，一直是欧洲身份的关键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是在一个测量时间流逝的地史学意义上的时期中（人类世），我们如何定义一个人生活的年代？想要下这个定义是尤其困难的，因为它与另一层级的责任有关；历史的能动者是不相同的。生活在现代时期与生活在人类世也是完全不同的。

是谁？这种时间与空间的混乱对定义人类行动者会产生更让人不安的后果；这些人类行动者在现代化期间，已经将自己当做历史上唯一的“能动者”。如今，地球对人类行为产生的反应如此强烈，已经很难分辨到底谁是行动者，而对于人类（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来说，怎样的行为才是合适的呢。更进一步的是，他们应该代表和在意谁的利益也越来越模糊。实际上，连他们是否应该将自己定义为“人类”都是难以确定的。在某个时刻，当他们被赋予一个重要的角色，以对地球的反应做出回应，他们作为一个集体似乎失去了处理这些变化的能力。一方面，他们被给予塑造地球历史的独特机会，但在另一方面，正相反，他们却沦为一个地质现象，并且对其不再有任何抵抗的力量。

探索时间、空间和能动性等各方面所共有的混乱对所有相信现代化的人来说当然是痛苦的，但对于准备好重估和重置现代性初始目标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我们必须关注科学中的各种概念：领土和主权的概念是如何被理解的，以及如何对待技术和宗教的角色。

总的来说，首先请欧洲代表团介绍他们将如何重置他们对于现代性的观点。而后工作坊将请中国方面尽可能全面地“测试”欧方的主张，讨论越是广泛越好。很明显，欧方提供的任何方案在中国语境下都没有什么意义。因此，我们希望建立一个翻译和商讨差异的复杂程序。如果我们成功地启动了这个程序，那么中国参与者将带来许多其他文档、例子、地点，情境和概念，从而产生关于现代性构成的不同观点。

举办这些工作坊的目的是通过这个重新评估的过程，来比较欧洲和中国的思想家、艺术家、知识分子、激进分子和官员们如何对付新的情境。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比较两个文化如何应对和重估自己的现代化轨迹，从而让我们以我们所面对的生态突变为对象，展开一个大型试验，并从中获益。两种高度复杂的文明曾先遭到各种现代化的冲击，而后于近期遭受新的气候机制的巨大反击，这为有效的会谈提供一个理想的背景。我们感谢上海种子项目为我们方案的第一次测试提供向前推进的机会。